

当代小说欧美卷

WENXUE

YUYUESHENG

Daxi

中国留学生

文学大系

上海文艺出版社

ZHONGGUO
LIXUESHENG
WENXUE 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

Daxi

当代小说欧美卷

本书编委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当代小说欧美卷/本书编委会—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ISBN 7-5321-1822-3

I.中… II.本… III.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9266 号

责任编辑:郑理

特约编辑:王 绯 杨 葵

封面设计:袁银昌

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当代小说欧美卷

本书编委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5.5 插页 2 字数 546,000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100 册

ISBN 7-5321-1822-3/I·1481 定价:35.00 元

《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江曾培

副
主
编

郑宗培

编
委

王 渝

江曾培

谷 梁

邹 平

何承伟

郑 理*

陈保平

陈骏涛*

郑宗培*

魏心宏

DA XI

Z h o n g g u o L i x u e s h e g W e n x u e

编
辑
例
言

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

● 自晚清时期，我国有了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后，一个多世纪以来，出洋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前赴后继，一浪越一浪。他们在海外的影响，对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本大系是从文学的侧面，精选留学生（访问学者等）写的留学题材的作品，为读者保留一份真实的历史的文学资料，亦是对中国近代以来文学发展史的一个补充。

● 本大系分小说卷和散文纪实文学卷；选编收录的作品，近现代部分按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次，当代部分由于选文丰富，按地区及发表先后编次。

● 为体现大系的广泛与丰富，编选时对同一作者的作品最多收录不超过三篇。

● 为尊重作者，尊重历史，本大系所收的作品，除对原作中明显的错漏别字和标点作了订正外，一律不妄作修改。翻译的人名、地名，皆保持原貌。

序 一

江曾培

文学的源头在生活。留学生文学,是伴随生活中出现留学生而逐渐形成的。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我国在一千五百年前就有留学生。不过,这只是一种个别的、零星的现象。留学活动真正形成规模和声势,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被洋枪洋炮打破以后。科学地说,留学生是近现代的产物。现在公认为我国第一位留学生是广东人容闳。他于1847年乘船赴美,在耶鲁大学学习四年,1854年底返国后,建议政府向美派遣留学生。1872年夏,第一批赴美留学生成行。此后,相继有学生赴欧赴日留学,形成了我国的第一次留学热。

我国进入近代出现留学热,有其历史的必然。陈腐愚昧的封建体制,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把封闭分散的世界日益紧密地联在一起。要改变我国的落后挨打局面,找出维新自救之路,再闭着眼睛妄自尊大不行了,需要睁开眼睛看世界。外出留学,无疑是“睁开眼睛”的一个重要形式。1899年8月2日,清廷军机处“奉谕旨”,传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留学人员事宜要加速办理,不得延误:“现在讲求新学,风气大开,惟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人出洋游学为要。”主张维新的光绪,虽然受制于慈禧,但以皇帝的名义发布此“谕”,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一种时代的潮流。有人认为,那时的中国,“留学问题几乎为一切教育问题或政治问题的根本。”这话不很妥帖,它过高地估计了留学的作用,但是,当时社会的风云变幻,变法图新,确无时无地不与留学生从国外“窃火”有关。戊戌以后的中国各界,都有留学生充任要职。在文化领域,像留学英国的丁文江创办地质调查所,留学美国的胡适倡导白话文,留学英国的严复翻译《天演论》等,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近代科

学、文化、哲学的发展。尽管留学生中也有倒行逆施的败类，留学活动也不是没有一点负面影响，但正如舒新城先生于1926年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一书中所指出，“瑕不掩瑜”，留学生对中国社会的变革作出了重大贡献。

留学生的出现，而且是作为一种重要社会力量的出现，自然也就会出现记述留学生和留学活动的文字。容闳（1828—1912），就写过一本很有影响的《西学东渐记》。湖南于八十年代出版过一套厚厚的《走向世界丛书》，其中不少都是当年留学生“走向世界”的记录。当然，《西学东渐记》这类书多系记叙文，还难于说是文学作品，但其中不乏情文并茂的篇什，可视为留学生文学的滥。到了“五四”前后，我国留学生人数进一步大增，形成留学的第二次浪潮。这其中出现了一些现代文学的大作家。创造社的几位创始人，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当时就都是留日学生。他们始初的一些有影响之作，如《沉沦》、《她怅望着祖国的天空》等，都是写留学生在异国他乡的见闻与感受的。可以说，留学生文学是形成中国新文学之河的一条重要支流。此后，老舍、巴金、许地山、钱钟书等名家，以《二马》、《马赛之夜》、《三博士》、《围城》等力作，拓宽了这条文学之流。无奈由于种种政治的社会的原因，这条文学之流此后没有得到很好发展，相反，随着我国重新趋向封闭，这条文学之流是越流越细，以至于断了。这样，在八十年代以前，留学生文学并未能形成“共名”，在我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一个“专门席位”。

八十年代开始，改革开放的政策带来了我国新的出国潮、留学热，大量人马冲出国境，泻向海外，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气势恢宏的“世界大串连”。在这种情况下，留学生文学又悄然复萌，且进展甚快，迅速成为一种“气候”。在这以前，台湾于六十

年代即有大批青年负国外，一些描写留学生生活的作品，如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白先勇的《纽约客》等，颇具影响。据此，也就有人注意研究这类作品。在美国纽约，由一批留美学者组成的文学团体晨边社，于1987年专门座谈了“留学生文学”问题。他们认为，“这类作品在现代中国文学中有相当数量，在海外的华文作品中，更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值得重视”。上海《小说界》呼应这一看法，特意全文刊载了晨边社关于留学生文学的座谈纪要，并在刊物上专辟留学生文学专栏，集中发表这方面的作品。相继，不少刊物也亮出了留学生文学旗号，一些出版社出版了“留学生文学丛书”。“留学生文学”至此大致取得了社会认同，文学筵席中，开始为它设立一个专门席位了。

也许是名正则言顺，新时期的留学生文学，或者说，当代的留学生文学发展特快，现有的数量，恐已超过现代与近代。它涉及到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就小说来说，不仅有短篇、中篇，而且出现了不少长篇，像《早安美利坚》、《我的财富在澳洲》、《英伦汉学家》、《陪读夫人》等，都有一定的影响。由于留学生是较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处在中西两种文化、两种意识形态以至两个世界撞击、冲突、交流、交融的交界点上，他们在思想文化观点的革新上，往往处于先锋地位，因而反映他们的作品，常常率先体现我国改革开放之际的价值观、伦理观、人生观等方面的变动。不过，这种变动，并非照搬西方的东西，简单地“全盘西化”。西方的东西并非都是好的，就像一部作品中对“青草地”所描写的那样，远远望去，你总会感到远方的草簇较自己脚下的来得翠绿、茂盛，但当你到了那里，又会失望地发现，它并不如你原先估计的那么美好。而且即使是好的东西，也不一定适合我们，即使适合了，也不一定能顺利地

拿来为我所用。因而，在留学生文学中，往往凸现着人们在变革中那种追求与彷徨、兴奋与痛苦同时交织的复杂心态。加以留学生出国，在思想上、观念上、生活上无论如何努力适应国外环境，也难于彻底楔入对方世界；而待他们归国后，又难于再彻底溶入自己人的圈子。正像有些留学生自己所比喻的：黄河的鲤鱼到了太平洋、大西洋，有一个怎样适应的问题；再游回黄河去，又有一个重新适应的问题。因而，他们成了人们所说的“边缘人”。“边缘人”能“广角镜”式地看东西方世界，但对东西方世界又都有“隔”，留学生的内心一般都弥漫着激烈的矛盾冲突。不少留学生作品中所透露的那种接近与疏离、清醒与怅惘、获得与失落以及乡愁、乡怨等情感，从一个新角度，展现了现代人心灵深层的搏动。也正是这种着重写人，写人的内心的做法，使得当前许多留学生题材的作品成为文学，而非非文学，并以其不同于其他文学的独特内涵与价值，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新文学现象。

应该指出，在当代的“世界大串连”中，有些人出国并非是要去学习，而是去打工赚钱。这部分人不是去“留学”，而是去“洋插队”。在反映这批人生活的作品中，较多的是表现他们在异国他乡生活的艰辛。有部作品把在国外打工叫作“吃苦”。然而，这些打工者并不怕“吃苦”，怕的却是没有“苦”吃。因为，“吃不着苦的苦比吃着苦的苦还要苦”。这种“五苦论”，是对他们生态的一种精当的概括。打工，要起早摸黑，一天接连干十几个小时，连吃饭拉屎都得打冲锋，是“吃苦”；不打工，“吃不着苦”，一切生计也就无着，结果“还要苦”。因此，他们的生活总是与苦紧紧联在一起。开始，这种苦使他们的身心不堪忍受，有人甚至想过不如“死了拉倒”。但是，慢慢地，他们多数都闯过来了。“苦”，逼得他们充分发挥了自己体力上和智力上的潜力，适应了

那里激烈的生存竞争。这样的作品对中西文化的差异,矛盾、撞击与融合的表现往往是比较弱的,与留学生文学应有的内涵存在差距,但是,“打工苦”也是大部分留学生所经历过的一个生活阶段,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的生态与心态,宽泛地看,这些“打工文学”可视为留学生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形势在发展,情况在变化。留学生的核心在“学”,“打工”只是他们在国外谋求生活自立的一种手段,一种过渡。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都已越过这一阶段,在“学”中面对东西方差异,引发了精神上、心灵上的种种思索与震荡。留学生文学需要深入跟踪进行表现。倘若仍然一味地停留在哀叹“打工苦”或炫耀“发财梦”的“初级阶段”,就不尽适宜了。

新时期的留学生,与前几代留学生存在一个区别。前几代的留学生,大多学成归国,出去就准备了回来;当代的留学生,不少人是要到国外寻出路,出去时就不准备回来。个中原因,比较复杂,不宜简单地把回国不回国作为爱国不爱国的界线,但是,这些“留”在国外的留学生,也就成了“学留人”,逐渐取得所在国国籍,变成了外籍华人。他们由此更深地楔入国外社会,对中西文化的矛盾冲突,对“无根”的“边缘人”地位,有着进一步的体验,从而有可能写出更丰厚的作品。像小楂的《丛林下的冰河》,蒋濮的《东京没有爱情》,袁玮的《无待的悉尼》等,都是写得比较深刻的,他们的作者,已都分别留在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了。这样,这些作品既仍可看作是我国留学生文学的延伸,同时也可视作为作者所在国多元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这些作者尽管是华人,但已属外籍。今年八月,我在澳大利亚访问,悉尼有八位华文作者送我一本合著,题为“悉尼八怪”。他们告诉我,有九位华文女作者,也出了一本合著,原名叫作“悉尼九丑”,后经过推敲,还是以女留学生们的一个深切体验

作名：“她们没有爱情”。从书名看，就可以看出他们在融入当地社会中的窘迫痛苦以及一种我行我素式的愤世嫉俗之情。悉尼原来是没有华文创作的，正是他们这批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去那里的大陆留学生，用自己的笔吐自己的情，在那里破天荒地耕耘出一块华文文学园地。他们现在大多数都加入澳籍，他们的华文创作，也就丰富了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在美国，在日本，虽然本来就有华文创作，留学生文学的兴起，也有力地推进了它的发展。因此可以说，随着一些留学生变成“学留人”，在所在国播撒华文文学的种子，留学生文学也就促进了世界华文文学的壮大。世界华文是一个坛。不同国家的华文创作，带着不同国家的特点，又散发着中华文化共同的“味”。它将“全球意识”与“寻根愿望”交织在一起。要发展这一联系世界华人的“坛”，留学生文学也有着它的独特作用。

1998年9月2日夜

序 二

陈骏涛

据纽约晨边社 1987 年 7 月的《“留学生文学”座谈纪要》说：‘留学生文学’是前些时我们几个朋友聊天时聊出来的名词。”^①大陆的“留学生文学”一词是否由此而来？这尚待研究，但上海的《小说界》于次年即 1988 年第 1 期起特辟“留学生文学”专栏，却可能是与此有关的。不管“留学生文学”一词起于何时，但留学生文学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向外派遣留学生的时候，却是一个很难否认的事实，尽管那时这类作品尚属凤毛麟角，也远未成气候。那么什么是留学生文学呢？说它是一批出国留学学者（含出国访学者和以出国留学之名在外居留或打工者）所撰写的有关留学生题材的文学作品，恐怕是比较多数人的意见，也是笔者所赞同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门洞开，被派遣出国或自费出国者越来越多，据说其人数已超过近百年出国留学人数的总和^②。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新一轮的留学生文学便应运而生。

—

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较早发表留学生文学的阵地当首推上海的《小说界》。从 1984 年开始，《小说界》就零零星星地发表了一些留学生文学作品，主要有小檀（查建英）的短篇《留美故事》系列^③和中篇《红蚂蚁》^④，易丹的中篇《天路历程——一个留美的故事》^⑤等。待到 1988 年正式开辟“留学生文学”专栏，就开始有计划地推介诸如小檀、王渝、易丹、戴舫、坚妮、江静枝、吴民民、于濂、李佩、夏云、严力、小草、施国英、王鲁夫等人的作品，并且发表了纽约晨边社的上述《座谈纪要》和该刊在上海主持召开的《留学生文学座谈纪要》^⑥。与此同时或稍后，上海的《文汇

月刊》、《收获》、《上海文学》、北京的《人民文学》、《十月》、《北京文学》，天津的《天津文学》，广东的《花城》、《广州文艺》、《特区文学》……都相继发表了一些这方面的作品。第一部留学生小说集《远行人》（阿苍著）也于1988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至此，留学生文学始渐成气候，并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近二十年的大陆留学生文学，尽管很难作绝对的阶段性划分，但说有一个大致的发展轨迹，还是可以成立的。九十年代之前的情况已如上述。这个时候的留学生文学作品，大多是叙写留学生们在异国的艰难开始和艰苦的奋斗经历，他们的种种遭遇和尴尬的生存状态，在两种社会文化冲撞下的一种进退维谷的“边缘人”的复杂心态，如此等等。大致都离不开“亲历性”和“倾诉性”，带有很大的“经验性”色彩。比较突出、在国内较有影响的作者有小楂、严力、蒋濮诸人。小楂的作品表现出一种典型的“边缘人”的复杂心态，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氛围，采用了比较新颖的表现手法，显示出一个青年作家的才情和锐气。她的《丛林下的冰河》被认为是“新留学生文学的一个开端”^①，是那个时候的一部不可多得的留学生文学作品。蒋濮在去国之前就发表过一些小说，去国后也写得比较得心应手，她写的一系列留日小说如《东京没有爱情》等也受到了好评。这两位女作家的作品可以代表这个阶段留学生文学的较好的水平。

纽约晨边社的《座谈纪要》对1987年之前的留学生文学有如下的评价：“把这些年报刊上发表的有关留学生的作品放到一起来看，会有一个印象，觉得这些东西是些刘姥姥观感和牢骚札记。”这话说得自然也有一些道理，但用到对这之前的整个留学生文学的评价上就显得苛刻了。当然，《座谈纪要》也说了：“用‘刘姥姥观感’

和‘牢骚札记’这样的字眼，好像刻薄了一些。其实，曹雪芹写的刘姥姥观感，屈原的《离骚》都是杰作。所以我觉得，不在乎写什么，而在于怎样去写。刘姥姥观感写好了，也是艺术品。”倒是国内有的评论家的意见是比较公允，也切近实际的。如李子云说：“八十年代大陆留学生人数众多，情况各异，在国外的处境与感受也各有不同，加以一些作者的文学观念也多强调从个人的独特感受出发，因此，难以出现能够引起广泛共鸣的作品。但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通过某个既独特又带有某种普遍性的东西，引起人们的心灵震颤或发人深思，而不是止于表现唯有作者本人感兴趣的现象、事件或心理过程。”李子云还把《丛林下的冰河》、《东京没有爱情》、《卜琳》、《再见吧，亲爱的美国佬》，统称为“新的留学生小说”，并且认为“这些作品的出现，使我们有理由期待更成熟更深刻的留学生文学的问世”^⑧。

这大概就是八十年代大陆留学生文学发展的基本状况。

二

九十年代初，大陆有几部留学生作品引起了大面积的社会反响，改变了这些作品只在少数圈内人中间谈论的状况，但这些作品并不是李子云所期待的那种“更成熟更深刻的留学生文学”，而是投合九十年代大众消费性文化心理的“纪实性”和“自叙性”色彩很强烈的“流行文学”，如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⑨和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⑩等。在信息膨胀、欲望膨胀的九十年代文化语境下，大众读者希望读到的是一些出国“淘金者”历经拼搏终至成功的作品，而不是“更成熟更深刻”的作品。《北京人在纽约》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国内以极快

速度发表和出版，并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电视连续剧在黄金时段播映创造了极高的收视率之后，连带着激起了读者和观众窥探留学生文学的兴趣，从而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留学生文学热”。与此同时或前后发表和出版的留学生文学作品（1990—1993年，仅举其部分成书者）有：

- 《丛林下的冰河》，合集，郑宗培、刘绪源编，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0 年版
- 《纽约白日梦》，合集，郑宗培、刘绪源编，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0 年版
- 《女博士旅美打工记》，高小刚、李惠薪、艾丹著，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0 年版
- 《极乐门》，蒋濮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0 年版
- 《日本留学一千天》，小草著，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1 年版
- 《到美国去，到美国去》，查建英著，作家出版社 1991 年版
- 《中国留日学生心态录》，吴民民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 年版
- 《我的财富在澳洲》，刘观德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 年版
- 《牛皮 303》，戴舫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1 年版
- 《此岸彼岸》，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1 年版
- 《瞬息年华》，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1 年版
- 《此岸彼岸》，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1 年版
- 《瞬息年华》，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1 年版
- 《东京的诱惑》，葛笑政著，军事谊文出版社 1992 年版
- 《日本啊，日本》，曾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

-
- 《上海人在东京》，樊祥达著，作家出版社 1992 年版
- 《泪洒多瑙河——中国人在匈牙利》，李中强著，中国物质出版社 1992 年版
- 《上海新贵族》，樊祥达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2 年版
- 《流浪女旅美打工记》，李惠薪著，作家出版社 1992 年版
- 《绿卡：北京姑娘在纽约》，曹桂林著，新世界出版社 1993 年版
- 《娶个外国女人做太太》，武力著，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月是故乡明——北京姑娘在东京》，李惠薪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
- 《相爱在哈佛》，朱世达、鲍光满著，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 《陪读夫人》，王周生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

如此等等。这些作品就其思想内涵和文学表现来说，自有高下之分，有的纯属于“赶潮”的纪实加想象之作，谈不上什么文学性，但都汇入了九十年代的“留学生文学热”之中。

面对这种情况，当时有些新锐的批评家曾经提出尖锐的批评，如吴亮就以十分尖刻的口吻说：“如今，移民们的竞相写作已达至畸形的繁荣（这与当下文化的下滑是密不可分的），源源不断的文学废品依次成为重要话题。人们不加辨析地吞食这些花哨的文字垃圾，然后把它随手扔掉。……在一个垃圾不断增多的文化环境中，移民文学正在迅速走向歧途。”^①这里所说的“移民文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留学生文学。这话说得自然不无道理，但倘若一概而论，就未免以偏概全、缺少分析了。留

学生文学中确有“赝品”，甚至“垃圾”，但也有不少确是严肃和苦心经营之作，不乏真情实感，也有一定的文学水平。如前面所提到的小檀和蒋濮的某些作品，王周生的《陪读夫人》，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等。《陪读夫人》和《我的财富在澳洲》可能代表了九十年代最初几年留学生文学的较高水平，也赢得了较多的读者。不过，连王、刘的作品都带有很大程度的“经验性”，“倾诉性”和“记叙性”压倒了冷静的叙述和艺术的想象，而打动读者的又恰恰是这种“倾诉性”和“记叙性”（当然是摆脱了矫情的倾诉和记叙）。上海的郑宗培曾经说过一番既宽容又不失分寸感的话：“这是一种名符其实的宣泄。看来，我们作为读者，有时还得设身处地宽容些。因为，这些作者是在非常的状况下写作的，并且他们在这方面的阅读交流、信息反馈等等要比我们想象的困难得多。……留学生文学这个文化现象要想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堂堂正正地占有一席之地，还需要一段时间，特别是需要一段跳出留学生生活然后回过头来再看它的时间。即一种积淀后的真正的审美意识，一种力度。”¹³此后一年即1992年岁末，在北京召开的一次“‘留学生文学’暨‘域外题材’作品研讨会”上，一些评论家的发言对这一现象也做了比较切合实际的分析，如雷达说：“新时期以来，文学思潮不断变幻，但有其内在的逻辑性、连续性，大部分作品体现的仍然是寻找主题；寻找世界，寻找自我。坎坷经历的倾诉压倒了文学性，这几年纪实的东西多，受欢迎，而文学性的追求不强烈，这是有社会原因的，是社会存在与心理对文学的选择，无形的手在把握文学。”白烨说：“这些年来，凡是构成热点的，都是非文学性的，一般都是社会性、文化性的轰动。包括文学性很强的作品产生影响都是这样，现在这种文学现象亦然，新闻性、纪实性很强。”¹³
